

# 基督教精神如何进入贺麟心学之思<sup>\*</sup>

顾红亮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241)

**摘要:**在留学美国期间,基督教精神不仅以感性的方式潜入贺麟的日常生活,而且以理性的方式渗入他的理智生活,这给他的“新心学”注入一股活的动力,为他的“新心学”构思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在他对“太极三义”、“心即理”的解说背后和对儒者气象的诠释背后,都隐含着基督教精神的影子。贺麟理解的基督教精神潜移默化地沁入到他的心学之思的内部,成为“新心学”的一个内在向度,这使“新心学”呈现出与其他现代新儒学相当不同的宗教哲学特征,使他在思考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话题时多了一个宗教化向度。

**关键词:**基督教精神;新心学;现代新儒学;日常生活;理智生活

**作者简介:**顾红亮,男,1971年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曙光学者计划等。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话语》、《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合著)、《儒家生活世界》。

电子邮箱:guhongliang@hotmail.com

## 一 引 言

近年来,儒学的宗教性话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贺麟的新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也受人瞩目。一些文章认为,贺麟阐发基督教精神的目的在于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阐释儒学的宗教化。<sup>①</sup>有学者认为,贺麟新心学的特色是它的宗教性。<sup>②</sup>有学者指出,贺麟新心学的背后有基督的情怀,他站在儒家人文主义的立场吸收基督教中有利于儒家思想发展的思想资源,用基督教来补充儒家思想。<sup>③</sup>有学者指出,贺麟对基督教的介绍,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的护教学,但是这种护教具有另类性,即不具有教会性,他所护卫的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是作为终极关怀的基督教精神。<sup>④</sup>上述研究成果都谈到贺麟的新心学重视基督教精神(情怀)的作用,但是较少注意更为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生活和学术环境使贺麟如此看重基督教精神的作用?基督教精神如何进入他的心学之思?

笔者认为,回答这些问题,要尽可能利用他在美国的学籍档案和日记,深入探讨青年时代的贺麟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新儒学与杜威实用主义”(12FZX021)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2-018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写作也得到 Oberlin College 的 Frederick B. Artz Summer Scholar Research Grants Program 的资助。

① 参见王志捷《论贺麟的宗教观》,《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刘颖《“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北方论丛》2008年第5期。

② 张茂泽《贺麟学术思想述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③ 参见胡军《贺麟“新心学”的基督情怀》,《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

④ 参见孙尚扬《另类“护教学”:贺麟新心学架构中的基督教》,《湘潭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美国奥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期间(1926—1930年)的日常生活、理智生活和哲学构思,也就是说,需要回答基督教精神如何潜入到留美期间贺麟的日常生活?如何渗入到他的理智生活?如何沁入到他的哲学构思之中?笔者把日常生活、理智生活和哲学构思视为基督教精神进入贺麟心学之思的“三部曲”。

## 二 基督教精神潜入贺麟的日常生活

贺麟对于基督教的认识有一个转变。早年他对基督教持反对态度。1925年,他曾代表《清华周刊》发表《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一文,主张加强对基督教的研究,这是反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最有效的方法。从此文的内容看,贺麟早年对基督教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留学期间,这一兴趣有增无减。正是在美国学习期间,他对基督教的态度由反对转向支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骨干,我们不得不正视其历史作用和文化遗产。他在1947年的一篇文章《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里简单叙述了这个转变的过程:“我个人过去在学生时代,因受五四风气的影响,对基督教亦甚反对,并曾见诸行动而有过相当的效果。其后在美国,与若干有道德有宗教思想的人士多多接触,思想才有了改变。不过我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故我绝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传道,而纯粹是站在哲学和文化的立场,觉得要了解西洋文化不可不知基督教,而基督教的精神确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采取。”<sup>①</sup>贺麟对基督教的认识在美国留学期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他和“有道德有宗教思想的人士”有了实质性的交往,基督教嵌入他的日常生活。

一个例子是贺麟与牧师同学的交往。1929年,他受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同学兼牧师莎提斯特朗的邀请,在一个教区的晚会上演讲《基督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在1929年的5月23日和25日的日记里提到这篇演讲稿(题目有改动)的写作,他写道:“今日将基督教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作毕,结论谓中国将有一新基督教时期如晋唐以后佛教之在中国然,而基督教之影响于儒家道家及中国风俗习惯、政教文物亦将如佛教然。”<sup>②</sup>在这篇文章中,贺麟回顾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为被误解的基督教做出辩解和澄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前景做出较为乐观的展望。牧师邀请他到教区演讲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基督教已经走进留美贺麟的日常生活,显示他对于基督教持有积极的姿态。

另一个例子是贺麟与毕勒夫人(Mrs. George Biller)的交往。贺麟在1927年暑假路过芝加哥,和几位朋友乘车前往位于威斯康星州拉辛市 Taylor Hall 的东方学生会,自此他便加入该学生会。他在美国留学的那几年的暑假和圣诞节都去东方学生会,由毕勒夫人提供路费,1930年他还担任过一届东方学生会的主席。十一年后,他在一份“人才调查表”(1941年3月26日)上填写“留学美国时,曾任东方学生会主席”<sup>③</sup>,由此足见他对这段经历的珍视。他对毕勒夫人非常敬佩和尊重,毕勒夫人对他也格外关照。他在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后不久,就接到毕勒夫人的贺信。他在1929年6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接毕勒夫人函,词多温慰。并赠美金十元,嘱余自购得意而可以带回国之书,藉表示彼庆贺我得硕士之意。余来美能得此有识有德者之厚爱之鼓舞,亦奇事也。彼与余之信札,亦远比余与彼之信札,较脱俗,且富于哲学宗教意味多矣。”<sup>④</sup>此话在很大程度上在上引1947年的话里得到了印证。在哈佛大学档案馆保存的贺麟成绩单上,有这样的信息:Relative or Friend: Mrs. George Biller; Address: Taylor Hall, Racine, Wis.<sup>⑤</sup>贺麟把毕勒夫人的地址信息留在他的成绩单上,如果哈佛大学在紧急情况下需要立即联系贺麟的亲戚或朋友,毕勒夫人就是贺麟的联系人。这显示他与毕勒夫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虽非亲

①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11页。

② 贺麟《哈佛日记》,姜文闵编著《哈佛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8、139页。

③ 《人才调查表(甲)·贺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事登记卷》,编号为22149,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129000011275A。

④ 贺麟《哈佛日记》,姜文闵编著《哈佛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61页。

⑤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UAV161.272.5. File 1 BOX 27.

人,但如同亲人。

毕勒夫人具有基督教的背景。美国全国教会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 筹建了一个虔敬与会议中心(A National Center for Devotion and Conference),该中心坐落在威斯康星州拉辛市的Taylor Hall,由毕勒夫人负责管理。<sup>①</sup>在与毕勒夫人亲如母子般的交往中,贺麟从她身上感受到人格化的基督教力量,基督教精神以感性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潜入贺麟的日常生活。

贺麟于1926年进入奥柏林大学学习。在这之前,蒋廷黻于1914—1918年在该大学就读。根据他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里的描述,奥柏林大学的基督教氛围十分浓厚。他说“欧柏林学堂的理想是自由教育。说明白一点,就是要使其学生成为一个品行好、学问棒的基督徒。因为学校注意宗教,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宗教活动。”<sup>②</sup>贺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学习了两年,对基督教生活自有一番感受。1945年3月28日,贺麟致信奥柏林大学校长E. H. Wilkins,推荐韩裕文到该大学学习,他在信里说“我的母校有真正的宗教氛围……在您的帮助和指导下,韩先生将有机会接触基督教文化精神……”<sup>③</sup>贺麟对奥柏林大学的基督教氛围有较深的体会,认为这适合有志于伦理学和宗教哲学研究的韩裕文的学习志向。显然,留美期间的贺麟在日常生活中对基督教氛围有切身的体验,并赋予其正面的价值。任继愈回忆说“过去,我曾认为《圣经》荒诞离奇,而贺先生则把它比作西方的礼乐,是西方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一点给了我很大启发。”<sup>④</sup>这个回忆印证了贺麟对于基督教精神的日常感受,这种感受与他和教会人士的交往、对宗教生活的体验是分不开的。

### 三 基督教精神渗入贺麟的理智生活

在留美期间,贺麟接触基督教徒,参与教会活动,基督教精神悄然地潜入贺麟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贺麟以理性选择的方式吸纳基督教哲学,使之主动进入其理智生活。

贺麟在奥柏林大学读书期间,跟随耶顿夫人(Ethel K. Yeaton)学习斯宾诺莎哲学,完成《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一文。该论文重点分析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分析斯宾诺莎眼里神的本性是什么、神性法则是什么、如何知神爱神。斯宾诺莎的宗教经历使贺麟领悟到宗教精神的力量和宗教哲学的魅力。“首先他以惊人的精神勇气反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忍受了被驱逐的折磨。最为我们钦佩的,就是他的这种勇气不是出于情感,而是来自理智,源于他对真理和理性的忠诚。”<sup>⑤</sup>虽然斯宾诺莎反对的是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但是他对宗教的反思态度和对泛神论的阐释,足以催人思考如何处理宗教精神和上帝的问题。贺麟在奥柏林的这段经历,无疑为他在哈佛大学学习基督教宗教哲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他主动选修宗教哲学课程,阅读宗教哲学著作。他与哈佛教授的交往对他理性认识基督教精神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位宗教哲学教授是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在贺麟修过的哈佛哲学教授课程中,他选修霍金的课程最多,持续时间也最长。根据哈佛大学档案馆的资料,贺麟在哈佛实际修了11门哲学类课程,其中三门课程由霍金主讲,分别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宗教和社会哲学研究”(Seminar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Society)、“鲁一士哲学研究”(Seminar in the Philosophy of Josiah Royce),“形而上学”和“鲁一士哲学研究”都是跨两个学期的年度课程。<sup>⑥</sup>据他自述,在“形而上学”课上,他提交的作业“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的意义及其批评者”获得霍金教授的“满分”。他的成绩单显示该课的成绩为“A-”。霍金在1912年出版著作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

① The Record of the Girl's Friendly Society in America, Vol. 32, No. 4(May, 1924), p. 88.

②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琰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9、63页。

③ Alumni Records Office "Ho, Lin" file, Oberlin College Archives.

④ 范进《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发言记要》,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407页。

⑤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0—61页。

⑥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UAV161.272.5. File 1 BOX 27.

perience, 贺麟曾将此书名译为《天在人类经验中之意义》。此书为基督教的上帝观辩护,指出上帝是人类世界的最后保证,只有在上帝的关照下,人类的生活才有价值。在霍金开设的“宗教和社会哲学研究”课中,他对于基督教精神和上帝的理解渗透在他的讲课内容中,这直接影响到贺麟对基督教精神的认识。

霍金开设的“鲁一士哲学研究”课程使贺麟深入了解鲁一士的宗教哲学观点。贺麟阅读过鲁一士的《近代唯心主义演讲集》、《基督教问题》、《哲学的宗教方面》等著作,对鲁一士的哲学颇为欣赏,曾在—篇比较詹姆士和鲁一士的文章中极力为鲁一士辩护,认为“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包罗一切的绝对,在绝对里,所有的冲突、善和恶都得到调和,错误和真理是可能的。”<sup>①</sup>在鲁一士的宗教哲学中,上帝或“绝对”居于核心地位,他提出了一个泛神论的上帝概念。贺麟后来评价说“鲁一士的宗教思想,属于接近于泛神论的有神论,他要寻求一个‘天者理也’,‘天理自在人心’那样的上帝。哲学上他属于唯心论,思想上要寻求‘绝对’的本体,所谓太极,这二者在他系统中是浑然一体的。上帝和本体二词可以换用。哲学上的太极亦即宗教上的神。”<sup>②</sup>在这个评价中,贺麟使用“理”、“太极”中国哲学概念,说明其中渗透着他自己对于鲁一士的上帝概念和基督教精神的理解。这个评价间接说明,在贺麟的哲学思辨中,有着鲁一士宗教哲学的印迹。

基督教精神在贺麟的主动选择中渗入到他的理智生活层面,使贺麟理性认识到区分基督教组织和基督教精神的重要意义。这个观点明确表达在《基督教与政治》—文中,此文虽然发表在1943年12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但是其观点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已经形成。他在哈佛日记(1929年6月13日)里记载,他在读了LaTourette写的中国的基督教史之后,做了这样的评价:“知其搜集资料颇富,而识见颇肤浅。其评耶孔二教之长短异同,及其论耶教在中国之贡献均不着痒处。对于耶教不分开典章制度的基督教与精神生活的基督教,终不能得正确之了解。”<sup>③</sup>这段日记记录表明贺麟对基督教形成了理性的看法,即区分基督教组织和基督教精神,以此评判LaTourette的看法,指出其书的缺点在于不分上述两者,无法凸显基督教的精神内涵。

贺麟指出,基督教精神的特点在于:“耶教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热烈的、不妥协的对于无限上帝或者超越事物的追求,藉自我的根本改造以达到之。真正信仰耶教的人具有一种浪漫的仰慕的态度,以追求宇宙原始之大力,而乞求与上帝为一。”<sup>④</sup>这段话包含基督教精神的两个内容:第一,基督教树立一种上帝的信仰,使人认识神圣的宗教理想,从而驱使人不断追求此理想。他回国后在一篇文章中说“上帝与爱人照耀着鼓舞着西洋人精神生活的两个光明的泉源,有如太阳与月亮。”<sup>⑤</sup>第二,基督教树立基督人格,使人反省自己的缺点,养成谦卑的做人态度,促使信徒自我改造。这两方面内容不可分离,相互配合。

贺麟在反思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之后指出,基督教精神在两个维度上被大家忽视了:一方面,一些传教士在中国没有正确传达基督教精神;另一方面,一些中国人没有从基督教中领悟精神的力量。“我感到很遗憾的只是,中国广大人民不能够从基督教的崇高理想以及基督耶稣的生活与教导里获得教益。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基督教在中国受到如此的误解,它已经被某些传教士歪曲了。”<sup>⑥</sup>贺麟在一些文章中试图给中国读者展示基督教精神的实质。在一篇题为《宣传与教育》的文章中,他举利玛窦为例,诠释“他诚恳的态度,坚定的信仰,服务的精神,专精的学术”<sup>⑦</sup>。像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远离故乡来异域传播福音。我们可以不认可他们的宗教教义和宗教组织形式,但是不得不钦佩这样的传教精神和人格追求理想。

①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7页。

② 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4—165页。

③ 贺麟《哈佛日记》,姜文闵编著《哈佛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④⑤⑥⑦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32页;第185页;第157—158页;第224页。

贺麟根据他对基督教精神的认识,反观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认识的主要弊端。他认为,我们一直没有真正清楚地认识西方文化。“五四”以来,启蒙思想家提倡科学和民主,相较于此前认识西方文化的努力,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是从“用”的层面去认识西方文化,没有进入“体”的层面。西方文化之“体”的层面指什么? 主要指基督教。他说“中世纪的基督教,是中古文化的中心,近代基督教是整个近代西洋文化的缩影与反映。可以说西洋近代精神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皆应有尽有。”<sup>①</sup>没有把握基督教精神,就无法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

由此,他论证西方近代的科学、民主、工业化和基督教精神并不完全抵触,相反,它们之间是可以相容和相成的。第一,基督教对科学有“保护促进之功”,虽然教会有迫害科学家的举动,但是正因为科学家受到外部的压迫,促使他们更加认识到科学探索的价值和守护真理的珍贵。第二,基督教本身充满民主精神,例如,在上帝面前人人一律平等,又如,一些教会把基督教的服务延伸到民间,为平民办学校、开医院。第三,基督教改革后的伦理观念也适宜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韦伯对此已作出了详细的论证。他自己对城市中教堂塔尖和工厂烟囱的细心观察,使他体会到基督教与工业化之间的某种联系。“一个城市中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总觉得是像缺了一面,是变态。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教堂的塔尖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两者都高耸入云,代表着同一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的两方面。”<sup>②</sup>如果人们的认识没有进入基督教精神层面,只局限于科学、民主和工业化,那么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始终是片面的和局部的。

不仅科学、民主和工业化扎根于基督教精神,而且近代新式功利主义也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贺麟举达·芬奇、穆勒、西季维克的话为例,说明新式功利主义关注社会福利,承载着耶稣的“己之所欲,则施于人”等宗教精神。<sup>③</sup>贺麟在此论证:基督教和科学民主是体与用的关系;我们了解基督教精神,不仅是了解基督教的历史和学理,而且是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透过对基督教精神的把握,可以扭转过去我们对西方文化认识的错误方向。

从贺麟选修霍金的宗教哲学课程,到辩护鲁一士的基督教哲学,到他阐发基督教精神的内涵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内在关系,一条线索清晰可见:基督教精神渐渐地渗入他的理智生活。

#### 四 基督教精神沁入贺麟的心学构思

基督教精神不仅以不同的面貌和方式进入(潜入和渗入)贺麟的日常生活和理智生活,而且潜移默化地沁入他的哲学构思之中,这一点主要通过上帝观和基督人格论体现出来。

《圣经》精义在于“上帝”观。在宗教中,“上帝”就是 The Absolute(“太极”)。在哲学上,与“上帝”相称的是“太极”或“绝对”。从翻译的角度看,贺麟主张用“太极”来翻译 the Absolute 这个词,认为这是中西哲学史上基本的哲学概念。“我仅以太极译表示形而上学的道体的哲学专门名词 The Absolute,而从众以‘绝对’译用处较广的形容词 absolute。”<sup>④</sup>哲学上的“太极”、“绝对”概念与宗教上的“上帝”概念,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贺麟在美国留学期间写成《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一文,对朱熹的“太极”观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太极”有三层含义,第一,认“太极”为“理”,是道理之极至;第二,认“太极”为“心”,是涵养用敬得来的内心境界;第三,朱熹是否把“太极”人格化,姑且不论,但是,在朱熹的诗歌中,他不自不觉把“太极”具体化为一种神仙境界。<sup>⑤</sup>“太极三义”说为贺麟阐发其“新心学”作了理论的准备,从中可见“新心学”的“雏形”。

心学之思的核心观念是“心”。何谓“心”? 按照贺麟的叙述,“心”有心理意义和逻辑意义两种。

①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50页。

②③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09页;第212—214页。

④⑤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56页;第630—640页。

“逻辑意义的心,乃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但为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之主体。……故唯心论又尝称为精神哲学,所谓精神哲学,即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哲学。”<sup>①</sup>贺麟的“新心学”偏重从逻辑的意义上理解“心”,与那种只从心理意义上理解“心”的做法不同,但是逻辑意义的“心”和心理的“心”并非彼此隔绝。“心即理”,就是把“心”与“理”统一起来,构成一个精神哲学,此处的“心”主要指逻辑意义的“心”。把贺麟对“心”的界定和上文提到的“太极三义”说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逻辑意义的“心”相当于“太极”之“理”义,心理意义的“心”相当于“太极”之“心”的一部分意义。从哲学上看,“新心学”的基础在于对“心”的理解,理解“心”的实质是理解“太极”或“绝对”;从宗教上看,理解“心”的实质是理解“上帝”。贺麟在构思“新心学”之际借鉴了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把它转换为“太极”或“绝对”概念,而“太极”之“理”义与“心”之义相通,可见,贺麟对“心”的致思背后有哲学的“太极”观或“绝对”观、基督教的“上帝”观的影子,心学之思的背后矗立着基督教的精神支柱。

再举一个“天”的例子。贺麟指出,“天”有三义:第一,指美化的自然,属于艺术家直觉的天;第二,指天道,属于哲学的理智之天;第三,指有人格的神、“无上圆满的神”,是道德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天。<sup>②</sup>用“心即理”的说法来看,知“天”即知人,即知“心”。在贺麟的“新心学”里,知“天”包括知宗教之天的含义或知神意的含义。在贺麟的知天观的背后,基督教的上帝观宛然可见。

贺麟阐释“新心学”是对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人格修养论上表现为儒者气象论。儒者是“新心学”的人格化身,何谓“儒者”?“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sup>③</sup>具体地说,在生活中,儒者气象转化为儒家的态度,就是要求做事要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从容乎中道。在近代历史上,孙中山是一个典范,“有儒者气象而又具耶稣式品格的先行者”<sup>④</sup>,是“新心学”的人格化形象代表,而且“新心学”的人格和耶稣的品格有相通之处。从致思之路上看,贺麟寻求“新心学”的人格化努力背后有他认识基督教精神的印迹,他认识的基督教精神的内涵之一是耶稣人格精神,这个认识在他对朱熹“太极”说的讨论中转化为对“太极—神仙境界”说的论述,在他的心学构思中转化为对儒者气象的探索。

贺麟对儒者气象或儒者人格的论述关联着他对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理解。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贺麟与同学何永吉有一次很长的谈话,其中谈到他对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间关系的理解。贺麟在1929年6月29日的日记里记下他自己的话“耶稣的生活,是宗教的生活,宗教生活是绝对的,故耶稣的生活可谓之绝对实在。孔子之春风化雨,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已经是‘化’了的生活,是艺术化的道德生活,艺术生活是绝对的,故孔子的生活,可以算是绝对实在。故必到宗教艺术之域,方可有绝对,而道德本身只是相对的。”<sup>⑤</sup>从贺麟的话里看出,他向往绝对生活,希望对绝对实在有一个深切的把握。要把握绝对实在,单靠道德生活是不够的,因为道德生活是相对的,不同于抵达绝对实在的宗教生活。与宗教生活有同等效果的是艺术生活,孔子的生活是艺术化的道德生活,孔子是儒者人格的化身,可以算是接触到了绝对实在。儒家的生活态度与基督教的生活态度既相同有相异,有殊途同归的意思。

贺麟把宗教生活和艺术生活看作高于道德生活,道德生活因其相对性有待于提升,提升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绝对界不可骤几,须在相对界奋斗之后,有了磨炼,有了操守,然后方可到绝对界而无流弊。”<sup>⑥</sup>从这个角度看,仅仅从道德生活层面诠释儒者气象是不够的,需要从宗教生活和艺术生活层面诠释儒者气象与人格精神。贺麟后来在阐发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指出三条具体的路径,即艺术化、宗教化和哲学化途径,这“三化”说进一步阐明儒者气象可从艺术化、宗教化和哲学化的角度加以把握,扩展了他在美国留学时对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的认识。

①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1页。

②③④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3—84页;第61页;第15页。

⑤⑥ 贺麟《哈佛日记》,载姜文闵编著《哈佛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70页。

上文指出,有的学者认为贺麟在建构“新心学”的过程中怀有基督情怀,其实,这个看法还只是揭示了一个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基督教不仅仅被用来补充儒家思想,而且基督教精神以感性的方式潜入贺麟的日常生活,以理性的方式渗入他的理智生活,这给他的“新心学”注入一股活的动力,为他的“新心学”构思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在他对“太极三义”、“心即理”的解说背后和对儒者气象的诠释背后,都隐含着基督教精神的影子。贺麟理解的基督教精神逐渐沁入到他的心学之思的内部,成为“新心学”的一个内在向度。

## 五 小 结

第一,基督教精神如何进入贺麟的心学之思?上文描述的“进入”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环节”:潜入日常生活,渗入理智生活,沁入哲学构思。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环节”在方法论上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同样适用于描述一种西方哲学理论如何进入中国的过程:先是潜入,可能只影响极少数人;再是渗入,其影响渗透到多个方面或领域;接着是沁入,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有机结合,呈现出日益中国化的趋势。

第二,一些论者已经指出,贺麟的“新心学”受黑格尔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甚深,他们的哲学理论都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新心学”。我们讨论基督教精神进入心学之思的过程,并不否认黑格尔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对“新心学”的渗透,而且认为,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对“新心学”的影响力在很多方面超过基督教精神。但是,这并不减损基督教精神进入贺麟心学之思这个课题的魅力,因为正是通过对基督教精神的领会和对基督教哲学的吸收,使贺麟“新心学”对于基督教及其西方文化之体用有一个同情的理解,使他在思考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话题时多了一个宗教化向度,亦即用基督教的精华充实儒家的礼教,从而呈现出与其他现代新儒学相当不同的宗教哲学特征。

第三,青年贺麟从上帝观和基督人格观的角度理解基督教精神,这种理解基于他的日常生活体会和读书上课所得,不是纯学理性的,可能有简单化的倾向,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基督教哲学家或者神学家,而且他的身份是留美学生。

第四,基督教精神进入贺麟的心学之思,上帝观化为“心即理”说,基督人格观化为儒者气象的人格说,它们均成为“新心学”的组成部分。这种“进入”大致体现了贺麟关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构想,这个构想延伸出儒家思想现代性展开的可能性话语。正如笔者在别的文章里指出的那样,这一话语有其内在的理论问题,例如,儒家思想现代性开展的现实可能性问题(如何可能)、儒家思想对现代性变迁的解释能力和效力问题(为何可能)、儒家思想现代性开展的客观途径与知识态度问题(如何可能)<sup>①</sup>,贺麟在把基督教精神融入心学之思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面对上述问题,需要正视儒家思想现代性话语的理论张力。

(责任编辑 付长珍)

<sup>①</sup> 参见顾红亮《贺麟的儒家思想现代性话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ield , this thesis describes such a new *tianxia* system as the “shadow dynasty” , which was comprised of various political regimes restrained by the central imperial court.

**Keywords:** *tianxia* , state establishment , the East Jin period , MURONG , Koguryo

## **Returning to Rural Areas as One Aspect of the Social Mobility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Jiangn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n Kunshan**

( by QU Jun)

**Abstract:** Besides routine migration from villages gradually to small cities , big cities , and then even to foreign countries , the intellectuals' social mobi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Jiangna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lso consisted of a tendency of returning to rural areas willingly or reluctantly due to their difficulties in the upward mobilit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available accommodation for them in villages , towns and small cities at that time on the other. With 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s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teaching staff during 1912—1925 in Kunshan ,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tendency of returning to the rural areas in the intellectuals' social mobi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Jiangn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ndency in modern China as well.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intellectuals in Jiangnan region , social mobility , Kunshan

## **Coordination and Suspicion: U. S. -ROK Relations Before and After EC-121 Incident of 1969**

( by LIANG Zhi)

**Abstract:** It appears that U. S. and Republic of Korea coordinated closely to deal with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before and after EC-121 Incident of 1969. In fact , new evidences reveal a profound suspicion between Washington and Seoul. The incident deepened the ROK's mistrust of U. S. security commitment and led up to new U. S. -ROK confidence crisis. Finally , Seoul sought ways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DPRK and achieve self-reliance in national defense. On the other hand , EC-121 Incident obliged President Nixon shelve his plan of reducing U. S. armed forces in ROK. Washington conside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U. S. presence reduction until November 1969. The main reason for U. S. -ROK confidence crisis lies in the obvious difference of cognition and conduction for Korean peninsula affair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Seoul. The case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common enemy may promote the two countries or regions with very different capabilities to form an alliance ,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share similar strategic thinking and judgment.

**Keywords:** Cold War , EC-121 Incident , U. S. -ROK Alliance , confidence crisis

##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on HE Lin's Philosophy of Mind**

( by GU Hong-liang)

**Abstract:** When HE Lin studied in the US , Christianity influenced not only his daily life emotionally but his intellectual life rationally as well. Thus Christianity provides a strong and vigorous spiritual support to his “new philosophy of mind”. We can see the implicit elements of Christianity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 meanings of the Supreme Ultimate( *taiji*) ” , “the equivalence of mind with principle” and the spiritual manifestation of a Confucianist. Christianity has penetrated HE's philosophy of mind in an imperceptible way and become one of its essential factors. This endows HE's “new philosophy of mind” with a special philosophy of religion which is absent in other philosophical systems of modern Confucianism and provides him with a religious dimension in his new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Keywords:** spirit of Christianity , new philosophy of mind , modern Confucianism , daily life , intellectual life

## **The Notion of Justice in Marx's Criticism on Fetishism**

( by SUN Liang)

**Abstract:** We cannot read Marx's notion of justice at a literal level. Both the epistemological concept of re-